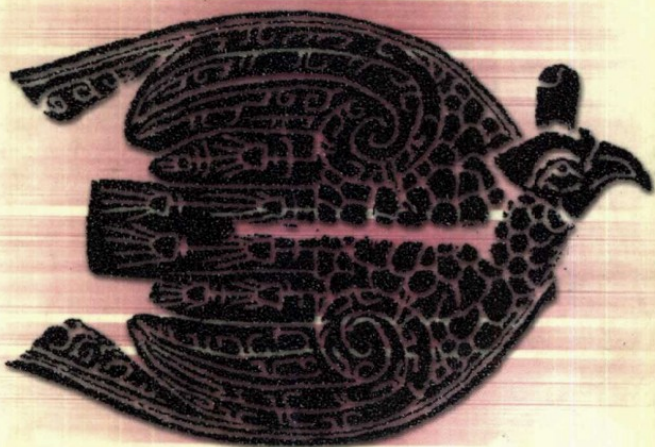


王曉路 著

中西詩學對話

◎英語世界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巴蜀書社

四川大學『211工程』項目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中西詩學對話

英語世界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

王曉路 / 著

BRU32/op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14583



巴蜀書社

2000 · 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西詩學對話/王曉路著. — 成都: 巴蜀書社,
2000.3

ISBN 7-80659-050-1

I. 中… II. 王… III. 文學理論—對比研究—
中國、西方國家 IV. 10-0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17907 號

策劃組稿: 陳大利 李 蓓

責任編輯: 李 蓓

封面設計: 文小牛

中西詩學對話

——英語世界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

王曉路 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

總編室電話(028)6656816

發行科電話(028)6662019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福利東方彩印廠印刷

成都神仙樹南郊村工業小區(028)5183822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1.125

字數 249 千

2000 年 3 月第一版

2000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000 冊

ISBN 7-80659-050-1/I·19

定價: 25.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編委會

學術顧問：楊明照

主 編：項 楚

編 委：周裕鍇 謝 謙 張志烈

曹順慶 馮憲光 周嘯天

劉亞丁 楊宗義 汪啓明

陳大利 李 蓓

常務編委：張志烈 周裕鍇

秘 書：張 勇

緒 論

人類歷史在世紀之交業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人類觀察外部世界和其自身的方式也已完全不同。科學技術以及經濟一體化所帶來的巨大變化使民族界限不斷被打破并使世界村得以形成。在這一新的歷史語境下，人們不再拘泥於原有的時空範圍，而將眼光投向更為廣闊的視野之中。與此同時，人們又不得不面對科學技術對文化所形成的新的挑戰，因為它涉及到文化資源、文化認同和文化借鑒等諸項重要問題。人類社會有史以來，不同文化間的廣泛交流從未像今天這樣頻繁。文化身份與文化互識的重要性由此更為凸顯。

倘若從歷史進程上看，文化間的誤解和沖突是生活世界的隔離性與不可通約性所造成的話，那麼這種時空關係已被日趨便捷的現代科學技術所打破。以因特網（internet）為主要特徵的信息產業化已經完全改變了固有的信息獲取與交互形式，這一異常便捷的瞬間對話與信息資源共享方式已將不同文化區域的人們帶入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化信息時代。它所造成的事實是，不同文化區域的人們已難以互相迴避或閉關自守，而這種新的開放態勢導致了人們對全球共有問題的意識以及對文化趨同性和獨特性的思

考。不同文化的差異性不僅沒有使人們固守在本土經驗的層面上，反而更加認真地在對待這種差異性，因為正是不同的文化模式才構成了文化的豐富性並使得文化互識與互補成為可能。

不同文化區域雖然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各自獨具特色的文化傳統、思維模式、符號系統和表述方式，然而人類追求生存意義的相通性以及在此寫作文本中主要採納語言作為情感認知符號的相似性卻為體驗、想象和理解“他者”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也為反觀自我提供了新的視角。具有國際眼光的跨文化理解和比較已成為當代學者不可或缺的方法論基礎。跨民族、語言、文化橫向模式在今天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那種狹隘地認為自己的文化模式最具普遍性的臆斷不過是自身的渴求而已。本世紀初由薩姆納（W. G. Sumner）提出的“種族優越論”，即不加批判地臆斷自己的種族及文化優於其他種類，或以自己的文化眼光作為衡量其他文化的標準，這一論調到現在已成為典型的貶義詞。正如著名學者薩姆瓦（Larry Samovar）所指出的，

我們常常為自己的種族中心的意向所影響。我們認為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最先進的和最標準的文化。……但是對種族中心的意向的意識能夠使我們認識到：我們所見到的另一種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對該文化的主觀的看法。我們必須學會接受這種思想：根據我們的文化偏見加以否定的東西，在另一種文化中却可能是正確的。^①

① 薩姆瓦等《跨文化傳通》陳南、龔光明譯，三聯書店，1988年，第109頁。

今天“歐洲中心論”或“歐美中心論”雖然已經被打破，但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以及以英文為主要信息語言符號的信息流的覆蓋，却使得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之間難以進行完全平等的對話。在這種雜語共生、多元文化得以倡導的時代，在經濟一體化所帶來的文化趨同潮流中，本土的傳統意識與非本土借鑒意識往往交織在一起，構成了複雜、微妙的文化現象。文化互融性與文化獨特性由此形成了某種張力。對於經濟相對落后的文化區域來說，一方面它必須面對強勢文化，即對西方文化中值得借鑒的東西，加以認真的透視、篩選和理性的思考；而另一方面它又必須依據本土經驗，在充分展示自身、發展自身的同時對西方以及自身傳統中的阻礙因素予以雙重梳理和清除，從而實現批判性超越。只有真正了解對方並讓對方真正了解了自身才能開始進行有意義的對話。而對於強勢文化來說，它也必須在文化中心論的局限中有所反審，不斷對異於自身的文化加以正視和理解，吸取異文化智慧，以達到建構性發展。這一點已被西方許多有識之士，尤其是漢學家所意識。

然而由於歷史原因及思維慣性，人們在進行這一整合研究中，在長達一個世紀的“西學東漸”中，已經較難避免西方現代系統話語模式的影響或隱性作用。人們即便在採納最適合本土文化的西方術語時，也極易忽略其話語範疇背后的概念群所具有的“不可共量性”，即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之特點。西方話語系統所基於的思維及言說傳統完全是其本土的文化滋生物。這些諸如綫性進化、理性至上、主客對立等概念範疇以及以語音為中心的語法語言為標記的展現方式並不具有絕對的普遍性。若將其硬套在源於不同的文化背景的文本之上，而忽略其概

念範疇背后的文化隱含指涉，這不僅會帶來負面誤讀，而且這種意義的建構也難以奏效。因而，對於異域理論的樣態和言說方式必須與本土經驗在雙重過濾的基礎上實施有機的結合。所以，文本的歷史語境表明，延續至今的文化區域間存在着由各自傳統所逐漸形成的不同的話語系統。而將源自不同傳統的優勢加以綜合，以互證、互識和互補的方式觀照對方、反觀自身，無疑會極大地豐富人類的審美及表述方式。因而跨文化互文性及文本間對話研究、文學研究與文化語境的關係在今天的文學研究中已顯示出舉足輕重的作用。

中國文論的發展，歷史悠久，內容豐富，體大慮周，它有着一整套不同於西方的概念範疇、文化架構和表述方式。深入研究這一領域，無疑有助於梳理中國的文學傳統和審美特質，為繁榮新時期的文論提供歷史的借鑒。一般說來，對某一文論的研究既可以通過自身的文化語境進行縱向深入，也可以通過他者的語境進行橫向探討，而二者的交叉和結合顯然會更有意義。但長期以來，中國文論的研究主要都是在自身的文化語境中進行的。盡管人們可以從古代文學理論的實際背景出發，利用所能發現的文獻資料，從歷史、文化、作品以及讀者等角度較為全面地清理各形成階段的文學理論及批評實踐的發展過程，以說明中國文論本身的概念及範疇內涵的演變軌跡，並對曾有所建樹的文論家與其論著作出相對客觀、科學的評價，與此同時努力挖掘出新的材料，從而在相對客觀、全面、準確地再現歷史面貌的同時，展示出中國文論所特有的價值。然而在這種置於自身語境之中展開研究的同時，却未從他者的語境進行反觀和借鑒並忽略將中國文論系統地介紹出去，忽略西方漢學界對中國文論的研究成果，這就難免

會帶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整體詩學的價值意義構成及其闡釋學理論與方法就會停留在古典階段，徘徊在現代世界的文藝理論主潮之外，”^①當然也就難以與西方詩學進行平等的交流與對話。

如前所述，對不同文化區域間的諸種不同的方式加以把握、比較與整合顯然是有意義的。因此，怎樣與世界各類文化交互作用，並在這種作用下建構自身已成為當代文化以及文論研究的重大課題。在當下新的歷史文化的語境中，各個文化區域都為自身的發展獲得了新的機遇。從自身觀察、傾聽他者，從他者反觀自身已成為文化研究的方法論基礎。中國研究外國，外國研究中國，中國研究外國對中國的研究、中國研究如何有效地讓外國了解自己，也已十分自然和迫切。在這一橫向互動的整合研究中，西方文論完全可以從中國文論以及中國的西方觀中審視自身，而中國文論也無疑可以從西方文論以及國外的中國觀中獲取新的啟迪。因此，中國文論這種“自我參照”的方式倘若不與“互為參照”相結合、對異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不加以借鑒和選擇、對其難以避免的誤讀不加以分析、不將中國文論系統地介紹出去以便讓西方對中國文論有更為全面的了解、不將中國文論話語中若干元命題加以激活並在實際文學批評中予以現代轉型並加以實踐，那麼，中國文論的研究就依然會囿於一種封閉式的模式之中。這樣既不利於外部世界對我們豐富的文論傳統加以深入了解，也不利於中國文論自身的發展，更談不上為世界文論的發展注入我們應有的血脈。

① 陳躍紅“走出古典的泥沼”載《中國比較文學》1997年第一期，第23頁。

一百年前，當西方文化強烈撞擊東土，促使中國人向外探求真理之時，一種以新的眼光反思古老民族的尋根意識也開始萌生。站在20世紀門口的王國維以歷史家從未有過的氣度寫道：“迴首西陸勢渺茫，東遷種族幾星霜。何當踏破雙芒屐，却上昆侖望故鄉。”這種迴眸反思代表了從戊戌到五四的一代學人的文化自覺與民族意識。^①

本世紀以來，一批學貫中西的大師，如王國維、聞一多、陳寅恪、吳宓、朱光潛、宗白華、楊周翰、錢鐘書以及季羨林等諸前輩均以特有的眼光和打通中西的功力，遂使這一領域的空間大大拓展，從而開創了將不同學科加以整合、將中國文學及文論與西方文學及文論加以比較研究的嶄新局面。人們開始意識到不同語境的參照系與跨文化（cross-cultural）、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的綜合考察對於本土文化及文論研究的重要性與其巨大價值。本世紀上半葉起就有不少學者開始注意到中國文學在海外的流傳情況。如陳受頤先生於1928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以《十八世紀中國對於英國文化的影響》獲博士學位。他迴國后又陸續發表了有關的論著。方重先生在三十年代撰寫了《十八世紀的英國文學與中國》。另外，朱謙之、范存忠等就十七、八世紀的中外文學關係進行了探討。錢鐘書先生的英文論文《十七與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中國古代戲劇中的悲劇》和《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等至今在海外仍有相當的影響。

隨着新時期的到來以及西方文學理論及批評方法的大量引

① 張皓《中國美學範疇與傳統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頁。

入，人們逐步採納了諸多西方文學的批評方法和術語對中國文學文本及理論寫作加以重新觀照和闡釋。這無疑有助於中國文論的發展。但是由於中國文論傳統與西方文論傳統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差異，因而若不採納系統性的消化與借鑒的方式，而只是進行話語表層認定，即簡單套用這些源於完全不同的歷史、哲學及文論傳統的方法及術語，簡單地將中國文學文本置於西方文論的框架中進行重新定位和剖析，這不僅難以對中國文學文本作出有效的闡釋和理論建構，而且有可能割裂中國文學及文論內在整體性和固有的生命力。而諸多西方漢學家也正是基於這一認識並從力求克服自身傳統的局限性出發，開始關注東方的詩性智慧並潛心進行着中國文化與文論研究的。如前所述，倘若我們只是熱衷於譯介現當代西方文論的新說，而不對其進行過濾性研究並與中國文論進行對比性研究，與此同時又忽略了將中國文論系統地介紹出去，也無視異域對中國文論的研究成果，那么就難以在不同語境的參照下將中國文論的研究推向深入，因而這種單向的引入與闡釋就存在着較大的局限性。隨着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國際地位不斷提高，以及文化研究的日益深入，今天的中國人已不再盲目崇洋或自我鄙視，而是以更為客觀和理性的目光觀察他者，審視自身。海外漢學為此提供了互為參照的契機。那種漠視海外對中國文化的研究的心態應當也正在得到改變。

可喜的是，海外漢學正日益受到國內學界的關注。港、臺學者由於文化交流的便捷性，已在這一領域先行了一步。國內學界近年來也已經注意到了這一課題的重要性，而且陸續選編出版了一批海外漢學界的成果，這些出版物有逐漸增多的趨勢。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海外漢學叢書”、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國

研究叢書”中均收有海外學者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論著，如美國宇文所安的《追憶》、高友工和梅祖麟的《唐詩的魅力》、倪豪士的《美國學者論唐代文學》；加拿大葉嘉瑩的著作在國內有多種版本，如《迦陵隨筆》（光明日報出版社，1986年）、《迦陵論詩叢稿》（中華書局，1983年）等；其中最全的是河北教育出版社於1997年推出的《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等十卷本。劉若愚的名著《中國文學理論》在國內已有幾個中譯本。樂黛雲、陳珏編選的《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1996年版）等譯介都較有代表性。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出版了宋柏年主編的《中國古典文學在國外》（1994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樂黛雲先生主編的海外學者學術演講叢書，其中包括浦安迪的《中國敘事學》和史景遷的《文化類同和文化利用》等；同時還出版了香港學者黃維樑的專著《中國古典文論新探》；北京大學還與南京大學聯合出版了“中國文學在國外”叢書，其中張弘的《中國文學在英國》已於1992年出版；湖南出版社與外文出版社還有計劃地出版、重版了一批中國文化典籍的英譯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世界中國學家名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美國中國學手冊》；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了翻譯本《美國學者論中國文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海外中國博士文叢”；江蘇教育出版社計劃出版由周發祥等先生主編的“國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書”，其中《西方文論與中國文學》已出版。一些學者的專著，如趙毅衡的《遠游的詩神——中國古典詩歌對美國新詩運動的影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王麗娜的《中國古典小說戲曲名著在國外》（學林出版社，1992年）、施建業的《中國文學在世界的傳播與影響》（黃河出版社，1993年）、

黃鳴奮的《英語世界中國古典文學之傳播》（學林出版社，1997年）、侯且岸的《當代美國的“顯學”——美國現代中國學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李學勤先生主編的譯論性專著《國外漢學著作提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國外漢學漫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以及“當代漢學家論著譯叢”，其中魯惟一的《中國古代典籍導讀》已翻譯出版（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以及其他有關的論文、譯文和專業刊物《國際漢學》等對這一領域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耶魯大學出版社與中國外文局正聯合計劃出版漢、英、法多語種的“中國文化與文明叢書”七十卷。這些工程不僅極有意義，而且已經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然而相對來說，這些出版物所涉及的中國文論還是較少的，且主要關注其流傳情況，沒有專項進行研究。實際上，西方，尤其是以北美為代表的英語世界，已在中國文論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形成了較強的學術陣容，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據日本學者的統計，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海外研究中國的重心已迅速地從西歐轉移到了美國，其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對先進的科研手段的利用已使其中國學處於世界領先地位。^① 其他隸屬英語世界的國家均受到美國的影響。如前所述，今天的信息時代所形成的媒介語言的作用和文化傳播的覆蓋面已經使英語本身的地位極大提高，加之英語作為主要學術成果的交流和轉換工具的影響，所以對以北美為中心的英語世界的中國文論研究加以透視，

^① 參見孫越生、陳書梅主編《美國中國學手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3頁。

并借用這一同樣的語言傳播中國文論就有着極大的意義。因此，從學理層面探討海外漢學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方式、認識其學術價值和地位這種在異文化語境中研究的實績，無疑對我們有着重要的參照、借鑒價值；其研究的方法、角度無疑會開啟我們的思維層面；其評介、闡釋以及囿於自身傳統及思維而難以避免的誤讀，也會拓寬我們的研究空間。所以，系統地介紹這些成果、客觀地作出評價、深入探討其研究方法，不僅可以使我們得以在“互為參照”的體系中進行具體和扎實的比較研究，還可以在此基礎上尋求激活中國古典文論若干元命題的方式，探索中國文論新的生長點以及進入世界的路徑，從而形成與西方進行實質性平等對話的基礎。

鑒於目前國內對海外漢學界，尤其是英語世界的中國文論研究情況還沒有全面、系統的了解、對於在世界多元文化背景下應着力充分展示中國文論自身并加強橫向研究這一工作還有所欠缺，本書嘗試通過“互為參照”的方式，首次全面梳理中國古代文論在英語世界的接受情況，就以北美為中心的西方漢學界對中國文論的理解、闡釋以及方法作出介紹以便於國內學界借鑒和深入研究，并對其囿於自身傳統所產生的誤讀作出自己的分析與評述，力求從不同的文化語境并以他者的眼光對中國文論加以觀照。本文在此基礎上着力探求將中國文論介紹出去的有效方式以把握某種中國文論與世界文論進行實質性對話的可行路徑，從而為深化這一領域的研究、為中國古代文論的內含面對現代精神開放、加強比較文論的基礎研究、為中國文論界參與世界文論的建構提供一個新的視角。本書的選題意義正在於此。

由於英語世界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它既包括以英語為母語的

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和美國等國，也包括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一些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等國，但是從筆者所收集的材料來看，除了美國，中國文論在其他英語國家中的研究相對來說還是微弱的，而且始終受到美國的巨大影響，這些國家中許多高校的中國文學教授也有相當部分是從美國獲得學位的。其他非英語國家的漢學家，如法國的侯思孟以及港、臺地區學者，亦有不少用英文寫作或從事漢學英譯工作。我國的著名翻譯家如楊憲益夫婦和許淵沖教授等在介紹中國文學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績。這些英文寫作和翻譯也常常被海外漢學界所借鑒。所以，本書雖旨在對中國文論在美國的接受為中心進行探索，但也涉及其他國的英文文本，因此仍以英語世界為總標題。鑒於貫穿中國兩千年始終的傳統文論主要為廣義的詩學和詩論，所以本書除了在第一、二章中對英語世界的中國文論研究作出較為全面的介紹外，其中包括小說、戲劇以及最有代表性的近代文論研究成果，以便為國內學者提供綫索，則將主要討論其對中國古代文論即傳統詩學的研究，力求在這一方面作一些初步的嘗試。本書的資料性較強，筆者雖然經過各種渠道進行了收集，但在國內進行這項工作的困難可想而知，難免挂一漏萬。對於一些國內學者已提到的極個別資料，由於筆者未查到原文，故不能隨意歸類評價。這些只有留待今后補充了。

由於本文在行文過程中常須引用海外學者的研究成果，為保證其資料性和閱讀便捷性，故採納當頁腳注的形式。鑒於海外資料查詢方式為：主題（subject）、作者（author）和標題（title）三類，為了便於國內讀者核對和檢索，因此在諸多學者及其論著在國內鮮有譯介的情況下，對文中首次出現的西文作者及論著以

括號形式列出原文，附錄中列出主要參考書目，以保證其資料價值性。文中譯文除注明外，均為筆者自譯。文中提及的漢學家若有其習用的漢名，即列其漢名；少數無漢名者或筆者尚不知者，仍按西文姓氏標準漢譯辭典譯出，對個別華裔作者采取了譯音方式，首次出現者括號標出原文，引用他人論述者例外。由於目前國內還沒有這方面較為權威的工具書，而且在這方面存在着混亂^①，筆者故在文后附有相關領域的主要學者，包括西方漢學家及港、臺學者的對照名錄，以方便讀者。

本書的出版得到了叢書主編項楚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及時的幫助。季羨林先生曾擔任我的博士論文評審，在聽說拙文列入出版計劃后，冒着酷暑在百忙之中寄來序言，鼓勵有加，令學生倍感學界前輩為學與為人的精神力量。對此，本人深表謝意。對於衆多學者和朋友的支持與幫助，我將在后記中專門表示感謝。在完成論文后的兩年中，我又收集了大量的有關材料，包括論文、譯著、譯文和專著等，但由於種種原因，這次很難加入，只有留待今后深入研究了。本人學識淺陋，加之本課題的難度和時間的緊迫，謬誤之處必然難免，敬請專家不吝指正。

^① 參見拙文《日凱特與李又安》，載《讀書》1997年11期。另見與朱徽合作的論文《比較文學譯著中的誤譯》，載《中外文化與文論》1999年7期。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 中西詩學對話 英語世界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 王曉路／著

◎ 晉唐彌陀淨土信仰研究 劉長東／著

◎ 文化轉型與中國古代文論的嬗變 楊玉華／著

◎ 歲寒堂詩話校箋 陳應鸞／著

◎ 敦煌變文研究 陸永峰／著

◎ 敦煌歌辭總編匡補 項楚／著

◎ 傅大士研究 張勇／著

◎ 碧鷄漫志校正 岳珍／著